

# 抗战前期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演变

——基于国际背景因素的考察

罗 敏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对中共态度的变化,不仅仅是基于国共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当时现状的考量,还与抗战前期国际形势的演变密切相关。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转向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但由于此时中共力量有限,又没有苏联方面的援助,他坚持以政治胜利者的姿态“收编”中共,导致抗战爆发前两党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蒋出于外交方面联苏的现实考虑,对共态度出现好转,国共关系由相互怀疑、戒备转为以“合作”为主的“蜜月期”。随着苏联援助对华抗战重要性逐渐减弱,蒋的对外政策重心转向联合英美,加之中共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1939年底,蒋之对中共政策发生逆转,又重新回到“剿共”的老路上。

**关键词** 抗战前期 蒋介石 对共政策 “和俄制共”

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对抗战时期国共关系的研究,主要从共产党的角度来探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变化对这一时期国共关系的影响,而对蒋介石及国民党对共态度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关注不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和“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总统档案”的开放,尤其是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公布,推动大陆史学界出现了“利用国民党史料来研究国共关系史”的趋向。<sup>①</sup>杨奎松作为这一新趋势的倡导者,其所著《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一文,克服了大陆学界以往较多关注从中共方面的史料来研究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的局限,依据两岸已经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深入分析了自抗战爆发至皖南事变期间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变化的过程。<sup>②</sup>杨天石所著的《蒋介石建议国共两党合并》一文,则主要利用蒋介石日记,揭示了抗战爆发初期蒋介石提议取消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共同组建“国民革命同盟会”之经纬。<sup>③</sup>本文是受上述学术前辈研究取向的启发所作的粗浅尝试,主要利用国民党高层政治人物蒋介石、王世杰、徐永昌的日记,将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对共产党政策变化的过程,放在抗战初期蒋之

①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第1—2页。

② 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③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2页。

整个国际关系视野中加以考察,以期深化学界对战时内政与外交之间相互缠绕的复杂面相的认识。

## 一、“编共而不容共”

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抗战初期国共关系转变的关键。不论蒋介石在西安承诺的内容如何,他一定程度信守了与周恩来之间所达成的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共识。1937年1月4日,他刚一回到南京,便立即致电陈立夫转告中共代表潘汉年,要周恩来速到南京,与他面商一切,切嘱周的行动“应极端秘密”;与此同时,蒋还亲派张冲专程从南京前往西安“接周同志南下会商”,但“须待周复电再行”。<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蒋虽然改变了原来所坚持的武力“剿共”的政策,但透过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谈判进程来看,他根本取消中共军队和政权的初衷未曾改变,只是方式由“剿”改为“抚”而已。1月22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25日,毛、周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同国民党谈判红军经费问题,要求全部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每月伙食费至少100万元。如照国民革命军待遇,薪饷再加购买费,每月至少120万元。<sup>②</sup>蒋对中共的谈判条件“决然拒绝”,于27日在日记中写道:“对共匪要求规定经常经费与亲笔函证,严斥其妄,终止谈判。”<sup>③</sup>在蒋看来,中共已是穷途末路,“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正是“收服”招安的好机会,“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之裔,则于其穷无所归时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也”。<sup>④</sup>

蒋之所以认为此时苏联尚未接济中共,主要是基于苏联政府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表现出的友好立场。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苏联政府即于12月16日致电苏驻华外交代表,令其紧急会见孔祥熙或张群,发表声明称:“(一)苏联政府得悉发生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见1936年12月14日《消息报》)当即表示明确而肯定的立场,谴责张学良这一客观上只能有利于企图分裂和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敌人的行为”;“(二)苏联政府……不仅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不言而喻的事),而且自日军占领满洲之时起,从未与张学良保持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三)鉴于各种虚假和诽谤性报道仍不断出现,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获悉蒋介石被释放回到南京之后,苏方驻华外交代表向南京政府表示:对这次冲突不经流血和内战而获得解决表示苏联政府十分满意的心情,并再次声明,苏联政府真诚地希望全中国的完全统一和巩固。4月3日,蒋在上海秘密会见苏联驻华使节鲍格莫诺夫时,请他转告苏联政府,对苏联新闻界在西安事变期间采取的立场表示感谢。蒋高度评价了苏方所表现出的友好立场,并答应他将采取一切措施改善中苏关系。<sup>⑤</sup>

由于中共既无苏联外援的接济,加之经过国民党的数次围剿后其实力已非常有限,蒋此时对共政策以“编共而不容共”<sup>⑥</sup>为基本原则。3月6日,蒋在日记中称:“对共匪只可编其部队,而决不许其成立军部,或总指挥部”;10日,又记曰:“对赤匪收抚不可迁就之条件”为:“不能设立总部”、“不

<sup>①</sup> 《汉年致毛、周同志电》(1937年1月4日、2月4日),转引自杨奎松《论抗战初期的国共两党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第122页;《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月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同。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01、703页。

<sup>③</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月27日。

<sup>④</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月30日。

<sup>⑤</sup> 《苏外交人民委员给斯皮尔瓦涅克的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18—419页。

<sup>⑥</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2月16日。

能成立特区”、“对其高级干部保护其自由权,如其愿出洋,则可由政府资送”。<sup>①</sup>此时,由于自身所处内外优势地位,蒋在坚持以根本取消中共军队和政权为目的之“编共”政策的同时,“示共党以宽大之意,使之知感”。3月26日,蒋在杭州与周恩来商讨解决中共问题的根本办法时,表示自己“独注重于其内部组织之改正,与根本政策之决定,以及认定领袖之地位各点”,而不计较“对共收降条件之枝节问题”。<sup>②</sup>

国共两党由于有过合作失败的教训,因此双方对再次合作的方式都非常谨慎。1937年1月,中共党内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已形成基本共识,主张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时,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sup>③</sup>3月26日,蒋与周恩来会晤时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他将国共分裂的责任“归过于鲍罗廷”,同时强调双方“彼此要检讨过去”,并承认自己“过去也有错误”;他要中共“不必谈与国民党合作,只是与他合作”,并且要求双方“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通过与蒋的会晤,中共方面认为:“蒋的谈话意图中心在领袖问题”,由于他明知“共产党的独立组织不能取消”,“共产党的国际关系不能取消”,“共产党不会无条件的拥护他,而他又不能满足党外合作”,所以“他要我们想新的办法”,“他认为这一问题如能解决,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否则必从各方面给我们困难,企图逼我就范”。<sup>④</sup>

蒋对国民党当年实施“容共”政策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能力心有余悸,5月12日,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共党方针与处置之步骤及办法,不与公开为宜”。次日又考虑:“应使其取消名称与改编组织,如此则拟积极指导,否则不许其公开”。17日,又记曰:“一、对共党办法:甲、取消名义与改组;乙、暂行三民主义;丙、领袖地位与权责;丁、军队改为国军。”29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如其要公开,则应取消党名”。<sup>⑤</sup>5月底,蒋在获知“共党已有取消党名之表示”后,提议要在两党之外另组新党——“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双方各派5人至7人组织“最高干部会议或团”;参加者的“手续”须“各先取消原有党籍,重填盟约、誓书”,“领袖有最后决定权”。经过一段时间反复思考后,蒋基本确定其“对共方针”为:“甲、经济从宽;乙、政治次之;丙、军事严定限制;丁、主张坚决绝对不能迁就;戊、行动须令一致己、区域与军官仅施监察亦可;庚、勿准联合各党各派主张;辛、勿准宣传;壬、改党名,暂行三民主义。”<sup>⑥</sup>

6月初,蒋在庐山与周恩来进行第二次会商过程中,坚持“编共”的原则毫不动摇,对共“警告”称:“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绝对服从与一致,不得擅自宣传”,“不得任意活动与组织”;强调“共党对第三国际关系由领袖主持负责”,“共党首要应离军区或出洋”,“共党宣言中应停止活动,则政治犯可赦免”。对于中共坚持将改编部队设立军事总机关,蒋严词加以拒绝,称“此决不能允许也”,并“劝共党减低目标,注重实际,恢复社会信用,改变观念,并免领袖为难”。6月17日,蒋又在日记中强调对共党,既要“优容”,又要“严厉监督”;禁止共产党“夺取群众”;陕北政权归“中央统一”;“毛泽东出洋”;取消“民主口号与各党派联合口号”;“不得为外国而抗日”。<sup>⑦</sup>由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3月6日、10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3月26日、31日“本月反省录”。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8页。

④ 《中央关于同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4月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册,第486—489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5月12日、13日、17日、29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5月25日、31日“本周反省录”。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6月5日、6日、7日、8日、9日、17日。

于蒋对中共所提组织原则与编制、边区政府等问题,都不同意,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双方“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过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蒋坚决主张设立政治训练处来指挥改编后的中共军队。周恩来只好最后声明:“不能解决时,要张冲进苏区来谈判。”<sup>①</sup>

由上可见,西安事变后,蒋虽然放弃武力“剿共”,转向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但由于蒋在谈判过程中始终以政治胜利者的姿态,坚持军事从严的“编共”条件,致使抗战爆发前两党之间的关系一度陷入僵局。

## 二、“和俄制共”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7月15日,周恩来携博古、林伯渠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准备郑重向全国宣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击,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但是由于蒋坚持“严厉监督”中共军队,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表示上述要求同6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以后各事之进行”。<sup>②</sup>蒋见信后虽然“愤怒甚盛”,但考虑到外敌当前,他最终忍而未发。<sup>③</sup>

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之际,蒋虽然开始考虑中共部队是否可以“不编而令其出”<sup>④</sup>,但其内心对中共的防范依然如故。8月13日,蒋在日记中称:“共党政客各方军阀之野心,思乘对外战争之机暴发其阴谋,当设法防制消弭之”,“多用小钱以填贪者之欲壑则几矣。”28日,又记曰:“惟共党态度渐恶,惟有顺受之。”<sup>⑤</sup>此时,蒋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以出兵抗日相要挟,提高改编条件。9月4日,蒋在日记中称:“共军退进必有要胁。”次日,又记称:“共党失信及反动当在意中,但无足为虑。”6日,蒋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共党对策应忍之。”<sup>⑥</sup>

9月22日,蒋介石同意发表中共所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公开宣布“开诚接纳”共产党“共同奋斗”的态度后,其内心对中共的戒备丝毫没有减弱。蒋对八路军一二九师一再延迟出动,断言称:“共党违约势所必然”,预定“令周恩来来京”。10月下旬,山西军事形势危急,蒋在日记中责备称:“晋战以朱德部投机取巧,不肯向敌侧击,故正面甚苦也。”25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朱部傍观,共党投机,应切实注意,然不足为惧,此种无信义之徒,决不能成业也。”在蒋看来,“共党与军阀只要多给其权利,动之以正义则可矣。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理应之”。<sup>⑦</sup>进入11月以后,随着淞沪战场形势的急剧恶化,蒋对中共的顾虑也随之增加,不禁暗自感慨道:“军事失利,各内反动派逐渐猖狂,共党尤为跋扈,外患未消,内忧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转乾坤。”<sup>⑧</sup>

然而到1937年底,蒋对共态度出现好转,国共关系由相互怀疑、戒备转为以“合作”为主的“蜜月期”。12月10日,南京失陷前夕,蒋重新反思对共方针是“放任乎?统制乎?保守乎?”认为: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第二次谈判情况向共产国际的报告》(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册,第492—493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页。

<sup>③</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16日。

<sup>④</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27日。

<sup>⑤</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13日、28日。

<sup>⑥</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9月4日、5日、6日。

<sup>⑦</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5日、22日、25日。

<sup>⑧</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1月4日。

“以全局设计,应暂使能与共党合作者共同抗倭似为相宜”。于是,他提醒自己注意:“应与共党从速谈判开始。”<sup>①</sup>21日,蒋介石主动邀请王明、周恩来、博古等人在武汉举行会谈。周恩来就中共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说明。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共商一切。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sup>②</sup>蒋对中共的表态并非敷衍之词,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对共党应放宽,使之尽其所能也”。<sup>③</sup>诚如杨天石所指出,让中共“尽其所能”,这是蒋介石处理和中共关系中最开放、最勇敢的决定。<sup>④</sup>

蒋介石与共产党的关系之所以好转,进入合作的“蜜月期”,一方面固然与日军攻陷南京后自身所面临的危机局势有关,同时更是出于外交方面联苏的现实考量。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希望通过援助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尽量让中国在远东拖住日本,使得日本无力北进侵苏。抗战初期,在美、英对华态度举棋不定时,苏联对华的积极声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蒋在抗战爆发之初对苏态度经历了欲迎还拒的微妙转变。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蒋的外交决策面临着和日防苏还是联苏制日的抉择。当时日本要求他共同防苏,“承认满伪特殊化”。蒋认为:“若与俄先订互不侵犯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美梦,不再要求”。他虽然担心联苏会“促成倭怒”,但“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况亦未必能为其全占也”。他于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最终决定选择联苏。<sup>⑤</sup>但是,当蒋获知苏联方面允许接济武器的交换条件,是签订中苏两国互不侵犯条约后,当面驳斥了苏方代表,痛斥“俄之外交狡诈无比也”。蒋怀疑苏联之所以欲先与我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欲“藉此威胁倭寇,要求与倭亦订不侵犯约以为固守中立之计”。<sup>⑥</sup>8月6日,蒋又在日记中记称:“俄提不侵犯条约,对外蒙问题,与不宣共产问题,应特别注重。”至9日,蒋终于下定决心与苏方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使倭不再梦想其与我订共同防俄条约也。”<sup>⑦</sup>8月21日,中苏正式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该约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第三国侵略时,则其对方不得对该第三国予以直接间接的任何协助。蒋认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当于现局利多害少也”。<sup>⑧</sup>

随着中日战事的不断恶化,蒋对苏方的援助愈加期待。9月6日,蒋在日记中开始思考“派妻赴俄之利害”。9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外交深信其为己,不能不助我也”。<sup>⑨</sup>9月中旬,蒋与苏联之间达成了飞机交涉协议,苏联方面愿意为中国政府提供空中援助。不过到了月底,苏方违背事先的约定,原本答应于月底飞抵兰州的飞机,居然一架也没到。不仅如此,苏方还召回其驻华大使,蒋对苏方的真实意图不禁有些怀疑,在日记中感慨道:“外交形势苏俄始终凉淡、投机。其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至今尚无一机到者,而且召其大使回国,究不知其用意所在?”<sup>⑩</sup>10月2日,蒋又在日记中记称:“俄机尚未到新,殊出意料之外。”由此,他判定:“俄态不欲积极助我,显而易见也。”<sup>⑪</sup>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2月10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37年12月21日,第403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2月21日。

④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Ⅱ》,第34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7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1日、2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6日、9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9月6日、9日。

⑩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0月2日、7日。

直至11月中下旬,苏方对华援助终于尘埃落定。11月12日,斯大林在接见中国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时表示:苏方愿意帮助中国在抗战中建设工厂,制造野战备用各种口径之炮;对于中国对日作战所急缺的飞机发动机,此后苏方将承诺“无限的供给中国”,其余机体则可派专家到中国制造,每月生产50架,以后逐渐加以扩充,每月可增至300架;关于作战所需汽油,陕、川、新均有油矿,苏联可代为组织,数月之后即可满足中国之所望。关于苏联参战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希望日本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sup>①</sup>11月28日,南京危在旦夕之际,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终于抵达,这对蒋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他在日记中表示:“俄机已到,尚可图挽救战局”。12月1日,又记称:“苏俄飞机今日第一批始到南京,惜时已晚,但尚有效用也。”<sup>②</sup>

对于中国这样的弱国要抵抗强敌的入侵,蒋介石强调“外交与战线并重”。<sup>③</sup>抗战爆发后,他一方面希望通过联苏来抑制日本的入侵,用他自己的话说,“联俄本为威胁倭寇,如倭早有觉悟则几矣。”另一方面,蒋又利用苏联担心中国与日本妥协的心理,向苏方表示:“对倭抗战到底之利害全视国际形势而定”,希望借此要挟苏联加强对华的军事援助。<sup>④</sup>与此同时,他希望通过改善与中共之间的关系,来增强苏联对华的援助。蒋认为:“抗战期间俄必不使共党反叛也”。基于这一判断,他对共态度转趋积极,开始考虑“共党参加政府之组织”,并表示要“统一抗战,使共党归服,消除矛盾行动”,并发出了要让中共“尽其所能”这一积极的表态。<sup>⑤</sup>

### 三、“内求国共合并,外与俄再进一步合作”

面对华北、西北、华中半壁江山先后沦陷的紧迫国难,在中苏关系渐入佳境的背景下,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虽然各自向前迈进一大步,但基于历史的教训与各自现实力量的对比,双方对两党关系性质与合作方式的理解却大不相同。蒋介石虽然认为对中共“不可排斥”,但其前提是“对共党主张消化”。<sup>⑥</sup>蒋主张“对共党之方针,使之融化”。蒋有意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先改造国民党,通过“改称党名”,“收容新党员”,“职业团体产业与劳工团体、文化团体、准予公开组织,但由政府领导”等一系列措施,容纳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派“组成大党”。<sup>⑦</sup>蒋介石这一“合并融化”中共的建议,遭到以“国共合作”为号召、强调两党平等地位的中共的反对。2月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反对合并,与我方之方针,此事宜缓处。”<sup>⑧</sup>次日,王世杰也在日记中记称:“邵力子日前曾受命与周恩来(共党首要人物之一)商共产党并入国民党事。周认为彼等如同意于此项办法,必致内部流血,且于国民党亦无益处。故此事势难实现。”<sup>⑨</sup>蒋经过反复研究“共党反对合并不能就范”之对策与方针后,10日在与周恩来会晤时表示:“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34—336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1月28日、12月1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9月12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2月2日、3日。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年12月7日、8日、9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月13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月29日、30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2月5日。

⑨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2月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176页。

中找出路。”当天,周恩来和王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综观蒋的态度,“一个党的思想仍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的意思”。<sup>①</sup>

周恩来对蒋此时尚无强制执行一党制的观察可谓非常精准。蒋对中共拒绝与国民党合并采取克制态度,会晤后第二天,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对共党宜宽缓”。<sup>②</sup> 2月25日,蒋在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时明确表示:“余对内主国共合并,对外拟与俄再进一步之合作,以应付最近国际形势之变迁。”蒋之对外拟与苏方进一步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对内处理中共问题时采取强硬立场。3月24日,中共中央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明确表示:“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在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许。”中共重提建立“民族革命联盟”的主张:由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由各方代表组成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sup>③</sup> 蒋对中共明确而坚决反对“一党制”依然采取宽容态度,3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共党主感召而不主排斥”,“对各党派主联合,使之就范,而不加强制”。次日又记曰:“团结党内,统一国内,使之坚强,是对敌国最大之打击。”<sup>④</sup> 3月底4月初,蒋介石在武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提出,对共产党应“采宽容态度”,“逐渐导本党以外各党派入于法律之道”。<sup>⑤</sup>

国共高层关于合并问题的悬而未决,导致两党之间的矛盾开始升温,尤其是两党在基层的摩擦呈现出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状况。<sup>⑥</sup> 4月27日,蒋在日记中表示:“对共党之态度应严正,本身立场与地位为先,而再以领导与联系处之。”<sup>⑦</sup> 5月10日,国民党五届中常会第七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指示各级党部务必严密防范共产党等党外政治团体及其分子,必要时可以严予取缔。随着国共之间摩擦的升温,蒋对中共的防范与戒备也随之增加,6月10日在日记中表示:“共党又起枭张,实不可放也”。<sup>⑧</sup> 与此同时,伴随战局的恶化,中苏关系之间出现的变数,也令蒋对中共的观感产生负面影响。8月初,武汉会战期间,苏方对中方所急需的购械合同故意托辞延宕,不肯签约。蒋对苏联的意图有些捉摸不透,不知苏方是“先待我武汉战况动摇而有所观望乎?抑或另有所待乎?”他将苏联对华态度的冷淡与此时中共的态度联系起来考虑,指责中共“将乘武汉战事动摇时欲有所企图也,幼稚已极”。<sup>⑨</sup> 8月13日,苏联驻华大使返回武汉前夕,蒋一面安慰自己“俄使之来意不必有所大希望,战争只有靠己者乃有可恃也”;同时强调“共党幼稚与猖狂,应制抑之”。8月21日,他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对俄外交方针与程度不能牵及内政”。24日,苏联驻华大使正式告知苏联不会主动与日本冲突,同时委婉拒绝与中方签订军事互助协定后,蒋的自尊心深受打击,在日记中以其特有的方式自我安慰道:“余以为不与任何国缔结军事协定,是于吾基本政策极有助益,是时代强勉中国以独立自由与自力更生也,故余甚以此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38年2月10日,第412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2月11日。

③ 王明:《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1938年3月11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3月25日、26日。

⑤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4月1日,第230页。

⑥ 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17—21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4月27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6月10日。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8月3日。

自庆也。”<sup>①</sup>苏联态度的冷淡与“共产党之居奇”激起了蒋心中强烈的民族意识,9月4日在日记中写道:“革命抗倭全在于己,即使苏俄与共产于我不利,则我国应独自抗战到底,应贯彻方针,否则民族亡矣。”<sup>②</sup>

武汉局势危在旦夕之际,欧洲局势的恶化令中苏关系意外转好。9月底,英法德意四国在慕尼黑签署协定,强迫捷克将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希望通过牺牲捷克来缓解德国与欧洲大陆英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德国侵略的矛头转向苏联。苏联为了应付来自德国的威胁,对华态度转趋积极。苏联对华态度完全因自身利害而转移,令蒋感慨不已。10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八月以来二电史太林无回电,要求其第二批订定之武器,切望其能于九月中旬武汉附近战争最烈时到达接济,而一无所应。及至欧局紧急恐我放弃武汉,或与倭媾和,其使节又以六十师武器五百架机示意。国际实情只有利害,毫无信义,更无是非。弱国惟有公理与信义是从,凡不义之物、非礼之事,虽至穷困败挫亦不能有动于衷。区区之武器何足为意,且其已订之物尚不能如期交货,则其示意之事物更不足计矣。然而苏俄较英法各国则实有惠于我,不可责人太薄,此不过为外交之纪事而已。”<sup>③</sup>

恰在苏联对华态度好转之际,中共代表周恩来于六届六中全会尚未结束便匆忙返回武汉,并于10月4日,向蒋提出关于改善两党关系的具体意见。周表示:共产党承认今后可加强国民党的领导权;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停止两党的争斗,但仍保留党籍;或先以少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看彼此协调情形如何,再商第二步计划;共产党员可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取消一切青年组织,但加入后仍需保留党籍。周同时保证,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蒋再次将中共态度的变化与苏联对华态度的转变联系起来思考,认为:“共党员八月杪全离汉赴陕北,及至月杪欧局紧迫,苏俄命其回汉表示合作,恩来不待其大会开完,而即回汉矣。”<sup>④</sup>14日,蒋约周恩来谈话,表示中共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常委会进行讨论,但是他认为三青团可以修改章程允许中共党员参加,只待进一步研究后即可考虑实行。<sup>⑤</sup>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党员采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合作方式,结果却反客为主,在成功地对国民党进行改造的同时,也引发两党之间无穷的纠纷,最终导致了合作的破裂。鉴于双方第一次合作失败的教训,蒋对中共再次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心有余悸,他开始认真了解自己的政治对手,自11月12日起,他开始阅读共产党密件《党的建设》小册子,认为“殊觉有益于我也”。通过阅读,他获知“干部决定一切”,“党的政治路线、战略与策略之实际应用在于党有坚强之干部,党的力量如何区分,干部如何同群众发生联系,干部所有之实际经验与理论准备之程度等问题应密切之联系。”<sup>⑥</sup>蒋在阅读《党的建设》一书时感触最深的是中共组织与纪律的严密。11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党教育与经验是由其国际百年来秘密苦痛幽围中所得之教训而成。故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组织最密,任何党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亦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读共党之《党的建设》一书,深有感也。能使其人趋向于民族国家之路线则几矣。”<sup>⑦</sup>他读过一遍《党的建设》后,觉得不过瘾,又重读一遍,并分发给下属学习。<sup>⑧</sup>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8月13日、21日、24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9月4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6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5日。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38年10月14日,第432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15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18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月3日;《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1月19日,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7页。

出于对中共组织力量的惧怕,蒋开始思考:“对共党防制之道,除改正本党重新本党以外,尚有其他法否?”“应不使其取得合法地位,为目前要点。”<sup>①</sup>12月6日,蒋在会见周恩来时,明确表示: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如果此点可谈,拟约毛泽东面谈;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6天后,蒋介石再次约周恩来、王明等会谈时,态度更为坚决,明确拒绝了中共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主张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政党。蒋表示: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sup>②</sup>

除去对中共组织力量的恐惧外,蒋之对共态度转趋强硬,也与广州失陷后其外交策略的调整有关。武汉会战爆发前夕,蒋之外交重心在苏联。6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记称:近来日本方面盛传孙科在莫斯科,已与苏联方面商定,由苏方将以两师团的机械化部队来协助中国。王世杰对日方这一消息的虚实不置可否,但观察指出:“惟日前孔庸之在国防最高会议报告,谓苏俄有以义勇军援助中国之意。似此,则日方所传当非完全虚构。……苏联方面,势不能不较过去增加其援助中国之程度。”<sup>③</sup>6月12日,蒋在军委会纪念周发表讲演时,“力称中苏两国,站在同一生死线上,今后任何人不得对苏俄攻击”。王世杰听过当日蒋的讲演后,分析认为:“此种表示,显有新倾向存在。近日政府对苏俄之洽商,似系由宋子文在汉口与俄大使接洽。”<sup>④</sup>蒋事后则对自己在讲演中对联俄意图表达太过,非常后悔,在日记中反省道:“心神不定之时说话更应谨慎小心,今日讲演对俄太重而对其他各国太轻也”,“不仅败事,且为奸人生心,部署增忧也”。<sup>⑤</sup>

1938年10月中旬,蒋获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附近登陆的消息后,认为日军此举目的之一是对英国示威,欲中国不借重英国而向其屈服”。日军南下进攻广州,减轻了蒋防守武汉的压力。10月14日,他在日记中如释重负地写道:“本日决定转移兵力及部署,甚觉从容裕如,敌在粤登陆实与我以最后胜利之基点,增加我胜心,协助我抗力非鲜。”次日,他又在日记中记称:“倭寇攻粤予我以灭寇良机,切不可失。对寇必须以太平洋各国和平会议解决中倭一切问题之期,当不远矣。”<sup>⑥</sup>随着日军进攻转向南进,蒋之外交策略的重心也开始调整,由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转向联合英美。用他自己话说,“制倭之道”“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克服中国之野心丧失”。<sup>⑦</sup>11月4日、5日,蒋接连两天与英国驻华大使长谈。在蒋看来,其与英国卡尔大使谈话“实为历史上重要之关节”。是年底,蒋回忆一年来国际形势之发展对我抗战形势有利的因素时,已全然不提苏联的援助,而是强调:“以英、美对我贷款,已不畏倭寇之强暴,可见敌寇之威信堕落,已不为国际所重视。九月间国联竟通过盟约第十六与第十七条,虽实际不发生效用,然敌我之优劣形势,已为之转换矣。此与去年九国公约会议无结果而休会时相较,已不可同日而语。”<sup>⑧</sup>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19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1938年12月6日、12日,第436—437页。

③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4日,第274—275页。

④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6月13日,第282—283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6月12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0月12日、14日、15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1月11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12月31日“一年中之回忆录”。

#### 四、“抗倭剿共双管齐下”

随着苏联援助对华抗战重要性逐渐减弱,加之此时中共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1938年底至1939年年初,蒋之对中共态度发生逆转。抗战爆发后,八路军实力的扩充迅猛,至1938年底,八路军由接受改编时的3个师34000人扩展到16万人左右,活动范围由山西一省扩展至河北、绥远、山东等地,并开始着手向华中敌后地区发展。1939年初,彭德怀向国民党要求将原来的3个师的编制扩展为9个师。<sup>①</sup>蒋此时视“共党到处发展”与为较“敌寇”更为严重的“急患”之一。1月6日,他在日记中称:“共党之猖狂日甚,彼或以此为其时已到乎?”1月16日,又记曰:“共党发展甚速;其势已浸凌日涵”。<sup>②</sup>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战时国共关系开始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蒋介石在大会报告中不仅公开提出要共产党统统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来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而且在内部更明确主张:对共产党必须“以严正的态度来教训管理他”。他说:“共产党捣乱是必然的,民国十五六年是如此,今天也是如此。”“拿十五六年时候的教训,同现在在中国共产党的现状来看,可以决定我们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共产党当然有他的策略,看过他的党的建设,可以知道的,他对于中国国民党自然没有好意。他所以要和我们合作,不过是一种策略而已。”他声称:“我们对于共产党不必有恐惧的心理”,“共产党是讲斗争的,你见他就怕,他格外要得寸进尺,正中着了他的希望。假如你拿出了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来对付他,他便赶快缩回了去。”<sup>③</sup>会议根据蒋所提出要“拿出有进无退的革命办法”的指示,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强调要学共产党的做法,“以组织来对付组织”,用最严密的组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明确提出:“纵因此而发生摩擦,设非出于本党之过与不是,亦应无所避忌”。<sup>④</sup>

4月14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密下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国共关系急转直下。<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限共方针出台之际,恰是苏联对华政策转变之时。1939年5月底共产国际鉴于斯大林有意改变对德政策,将战争祸水西引,开始要求各国共产党提防资产阶级政党及其政府翻脸。6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开始提出:“要做国民党乃至蒋介石叛变的思想准备,为此要严密党的组织,每省建立一个到几个根据地,保存精干,准备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必要时打游击战争。”<sup>⑥</sup>共产党人此后在山西、河北处理与国民党摩擦时态度转趋强硬,显然与此时苏联外交政策的转变有关。

蒋此时对苏联对华外交政策的转变显然缺少预判。5月17日,蒋在日记中记称:“俄对华政策突变,爽约之原因何在?”次日又写道:“俄国今日停止接济,不足为虑,而前三日全数应允,固亦不在我意中。”紧接着,他又马上想到:“共党问题以后渐紧矣。”在蒋看来,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若是因为中共问题的话,对自己“关系尚小”;若是因为苏联欲与日本妥协的话,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就严

① 《徐永昌日记》第5册,1939年1月8日,第3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月6日、16日。

③ 《总裁在五中全会讲演: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1939年1月26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5.2/159。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27页。

④ 《院长孔祥熙令》(1939年3月3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特005/25.13。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27—28页。

⑤ 详见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29—32页。

⑥ 《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6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第32—33页。

重了。为此,他在该星期的反省录中写道:“苏俄外交突变,不为共党,必为倭寇,吾惟有以既定方针忍耐进行,非至其与倭寇妥协有事实表现,不可有所表示。”<sup>①</sup>

直至5月底,苏日在诺门坎冲突爆发后,蒋才如释重负,心情明显放松,于5月31日在日记中写道:“苏俄态度好转,购械事当能实践也”,“共党动向之渐转,似已感觉吾之决心与方针矣”。不过,经历这场“虚惊”后,蒋对苏联的恶感明显增加,在日记中写道:“俄国态度显现冷淡,其对华外交方针本来如此,无足为异,凡不能自立而有求于人之时,无论何方皆无诚意可言,此英法亦然。而美国之和平与公义之传统精神则自不同耳。故美国实为我中国之至友,而俄国之对华态度无论如何,我应以诚意应之。”<sup>②</sup>此时,由于日苏冲突削弱了日本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力度,这让蒋得以暂时腾出手来转向对付中共。6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下“对共明言各点”：“甲、共党应正式宣布,表示取消共党之组织与活动,必须名实一致,乃可准其所称;乙、否则如不愿取消或不遵法令,不顾大局一如过去行动,乃为妨碍抗战,亦即增加敌军势力,此种责任应由共党负之,我中央不能长此坐视;丙、中央决不受人压迫与欺侮;丁、未遵令退撤,不再谈话。”次日,又记曰:要“对共党明言特区不准者乃成割据而反统一也。”解决完久压心头的“悬案”后,蒋非常欣慰地在日记中称:“对共党痛斥其不法与封建言行,于心于理皆安。”<sup>③</sup>

1939年八九月间,《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签订及随后爆发的欧战,不仅对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的外交策略产生重大冲击<sup>④</sup>,更影响到其对内处理与中共之间的关系。蒋对欧战爆发后日苏关系的走向出现严重误判。欧战爆发后,苏联并未如蒋所预期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sup>⑤</sup>,向日本施压,而是相反通过与日本签订停战协议,“专力向欧与德瓜分波兰,使敌倭在亚东坐大,得以全力侵华,此则时局之变迁每与所想者相反。”<sup>⑥</sup>日本与苏联签订停战协定后,趁欧战爆发之机,加强了中国战场的攻势,先后向湘赣和桂南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受日军进攻的牵制,蒋暂时无暇顾及中共,其对共态度有所缓和。10月28日,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对共党态度坚强是好处,但躁急不逊是坏处,应切改之,以后应以严正静定处之。”此后他又在是月反省录中表示:“军政内部之意见与共党之磨擦渐烈,应特别注意,适心调剂之。”<sup>⑦</sup>

此时,日苏之间出现的妥协动向引起了蒋的关注。11月1日,苏联外长在其宣言中表达对日妥协之意,“对华未提只字”,蒋由此怀疑:“其态度凉淡而方针渐变乎?”他由苏联态度变冷进而推及认为:“中国共产党之跋扈与臬张以后必甚,叛乱不远乎?”11月4日,蒋又在日记中写道:“俄诱倭妥协,倭亦有向俄屈服可能”,“共党行态以后必不出反对与暂时缓和二途,应准备一切。”<sup>⑧</sup>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分析,蒋于是月底得出结论认为:“中共于最近期内将有变故之猜测,及苏俄与倭寇协以谋华之谣诬,于理于势皆不可能,如其有意反华,则其态度决不致突冷,正惟其突冷,乃能以欺倭而暗助华,故中共亦不致突变,然不能不防耳。”<sup>⑨</sup>

蒋为了防止日苏妥协,积极改善与苏联之间的关系。12月1、2日,蒋接连两天手书致斯大林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17日、18日、19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6月8日、9日、10日。

④ 王建朗:《欧战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鹿锡俊:《蒋介石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反应》,《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0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1月1日、4日。

⑨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1月30日“本月反省录”。

两封长函,洋洋洒洒千余言,非常详尽阐述了欧战发生后远东问题的重要性及解决之道。蒋在函中指出:“远东问题解决之惟一重要前提,厥为苏联与英、美之一致,日本侵略大陆之野心能否消除,其关键全在贵国。”蒋深知欧战爆发后,苏联与英美之间关系出现分歧,他向斯大林建议指出:苏联与英美之间分歧“纯为对欧洲关系”,“而在远东问题上,则英、美与苏联之利害与立场,实无不始终一致”,“且以远东问题为重心,即将为英、美与苏联在国际上合作之枢纽”。蒋为了防止日苏妥协,提醒斯大林要注意日本的外交阴谋:“日本最近之外交,表面上为对苏联、对英美同时进行,然其真意,则在以苏联之姿态威胁英、美,是英、美与之妥恰,以实现其所谓东亚新秩序,俾得首先解决中国而后以全力对付苏联”。<sup>①</sup>

恰在蒋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之际,阎锡山手下由共产党帮助组建的新军发生叛变。12月15日,他在日记中提醒自己注意“晋牺盟会之反响”。此时,为了不影响中苏关系的改善,蒋宣称:“要在政策上战胜敌党,故对于共党要有贤明决断之政策及伟大宽缓之态度。”提出:“对于政敌不是将其打倒,而是要为我来用,今日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不要勉强解决,只要解决其目的的前提,这是科学的方法。”<sup>②</sup>12月25日,蒋获知:“共党促动阎部叛变,阎所信任新练决死团十余团皆为共党煽动,其八路军竟掩护叛军而收容之”,“共党在甘之镇原县亦发动”。面对中共的武装反抗,蒋没有选择武力解决,而是主张:“对共党此时当先严密防范,相机制裁。”<sup>③</sup>29日晚,蒋又接到中共方面朱德等人有日通电,要求政府惩办肇事祸首,取缔反共邪说。蒋据此判断认为:中共“乱迹已显”,“但其用意仍在乘机扩充地盘,巩固边区,甚恐我军进剿也”。根据这一判断,他主张:“此事应大事小做,不必重视,惟布置军队准备实力而已”,“一面对俄应说明中共捣乱实情,对共应宽严兼施,然不与其实际利益”,“此种乱党叛徒,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实难养甚于小人也。”蒋之所以专门召见俄国总顾问谈中共之事,要使苏方注意此事,是因为他此时正担心“俄国对我意见尚未明复,其必不乐闻乎?”<sup>④</sup>

苏联之所以迟迟没有回音,是因为苏方对中国在为英美所操控的国联投票开除其会员国资格时,没有表示反对而深感不满。苏联伏罗希洛夫元帅及莫洛托夫外长在与中国驻苏大使杨杰会晤时称:“国联开除苏联会员籍时,如中国代表反对,决不至有此结果,此次中国出席国联代表之举动,无异帮助英、法打击苏联,是何用意,令人难解,截至今日止,中国方面未见有任何人向苏联解释此次用意所在,希望贵使报告贵国政府。”<sup>⑤</sup>蒋之汲汲于联苏,是欲由中国出面在远东协调建立英、美、苏联合对日阵线,而此时苏方却因中国未投票反对国联开除其会员国资格,以及对苏芬纠纷保持沉默,认为中国是在欧洲帮助英美打击自己。双方这一完全相反的相互认知与期求,令中苏关系在1940年初陷入低谷。不过,由于欧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大为减少,蒋此时对苏方的接济已不是非常看重。1月9日,他在日记中记称:“俄国外交态度已显然变更,对我接济固不必希望,但亦并未有所望也。”他甚至将苏联对华态度转变与苏联空军志愿兵表现不佳联系起来,认为:“俄空军志愿兵屡次损伤飞机与贻误工作,错认目标,大可注意此决非偶然之事也。”<sup>⑥</sup>此时,蒋已将争取对华援助目标转向美国。他因顾虑中苏商约的发表会影响美国对华第二次贷款的接洽,下令暂缓发表。关于交换中苏商约的最好时机,蒋认为:“待对共党朱、彭命令革职时行之,以表示联俄不容共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356—357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2月16日、17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2月25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9年12月30日。

⑤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2),第363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月9日、11日。

之意,或对英美外交能起一作用也。”<sup>①</sup>

随着苏联对华影响的逐渐淡出,蒋开始放手处理对共问题。1月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共态度自亦不久叛变固无疑乎?然并无所惧也。”<sup>②</sup>12日,他开始考虑“对共党不法事实发表之时机与方法”。<sup>③</sup>18日,何应钦在国防部最高委员会报告:山西方面阎锡山所部新军叛变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所部收容,不肯交出,意在助新军压迫阎锡山,情势严重。朱德等并有第二次通电致林、蒋及各报馆,指摘陈诚之反共,及中央待共产党军队之不公。<sup>④</sup>蒋对朱德等人第二次通电之反应明显不像第一次那样“伟大宽缓”,声称:“中共恶劣,匪心不改,亦惟有以严正处之也”。<sup>⑤</sup>27日,蒋考虑“对共党之整个计划”,认为:“甲、先取守势;乙、不与法律地位;丙、不必交涉。”此时,蒋对中共问题的处置显得胸有成竹,认为:“共党叛变逆迹彰著,然此时已无大患,以倭寇之势已衰,抗拒之力有余,且后方共匪无几,其力全在战区,故抗倭剿共可以双管齐下,且共匪适夹在敌我之间,更易为力,此则抗战之初使共匪调往前方之效,未为其所欺,其利固甚大也,此时只要后方兵力充实,严密布置可也,如果在前年或去年冬季共匪叛变,则大局危矣,今则不足为患矣。”<sup>⑥</sup>3月22日,他又在日记中称:“半年来共党形势汹汹,叛迹日著,而其跋扈嚣张几乎不可向迩,彼一面挟苏俄以自重,一面又乘倭寇深入之机胁迫政府,以为政府无奈我何,所以陕北、晋冀皆为所欲为,并明目张胆屡次公开诋毁政府,污蔑党国,无所不至。此种事实,不仅幼稚狂妄,诚是荒谬绝伦,其所作为比于民国十五年时代尤为不如也。匪性不改,何能望其革命,更不配说为共产。据称史大林对陈绍禹明告:其此次共党参加抗战,无异在大海游泳,如果得法乃可登彼岸,否则将溺沉于海中,又嘱其中共非有卅万劲旅不可企争政权,然而中共今日之行为完全相反,焉得而不败。余决不以苏俄与倭寇之关系受其胁迫,且必执行余之职权,以制服此不法无知之徒也。”<sup>⑦</sup>

由上可见,随着日军对华攻势因战线拉长而明显减弱,加之苏联因素逐渐淡出,以及中共自身所处不利位置,在诸多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蒋之对共方针由抗战爆发后之“合作”又回到“剿共”的老路上。不过,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蒋介石想要重新运用军事“剿共”的方法来防止中共的壮大,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局部军事冲突在所难免,但又不能演变成全面冲突。其中分寸的拿捏与时机的把握是对其政治智慧与战略能力的严峻考验。

[作者罗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志毓)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月5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月9日、12日。

③ 《王世杰日记》第2册,1940年1月19日,第214—215页。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月20日“上星期反省录”。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1月27日“上星期反省录”。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0年3月22日。